

冷战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新中国国际贸易

——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东南亚棉纺市场的进出口为中心

吴博皓

内容提要: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东南亚地区去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该地区逐渐摆脱殖民体系下对宗主国的商品依赖,并成为中国商品尤其是棉纺品的重要出口市场。这一时期中国在发展东南亚贸易的过程中,也面临来自美、日、英等国的激烈竞争。然而,各国通过经济外交手段促进本国对东南亚的棉纺品出口,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也有着通过经济手段推进本国地缘战略的目的,该时期的东南亚地区棉纺贸易呈现出了较强的国与国之间对抗的色彩。同时,本文也从经济外交的角度,阐释了在冷战这一场全方位、高强度、长时段的大国竞争中,政府与民间力量密切互动的特点,从而为我们理解冷战背景下新中国的外贸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冷战 棉纺品 国际贸易 地缘政治 东南亚华侨

对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关系,尤其是新中国与东南亚、东北亚国家在经济问题上的互动,既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援助与工业化角度出发,探讨由政府主导的工业建设项目以及技术转移对受援国经济状况的影响。有学者关注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交流,如郭又新等,探讨了中国、苏联、朝鲜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经济合作,^①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等海外学者也考察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苏联因素。^②另外,部分学者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面临来自西方阵营的经济封锁展开讨论,如崔丕等重点考察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体系下西方的对华经济封锁问题。^③近年来,研究者亦开始强调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如姚昱等探讨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缅甸、柬埔寨、马来亚^④)的经济往来。^⑤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以政府间交往为研究对象,对于具体经贸问题,尤其是新中国通过对国际市场出口获取外汇等经济活动,尚未给予充分关注。

对于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对外经济关系以及与东南亚华侨之间关联的研究,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已有研究多以“中国政府-海外华侨”这一组关系为中心展开,而未引入冷战早期广泛存在的国家间多边博弈的分析。如格伦·彼得逊(Glenn Peterson)等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以新中国对外贸易部的

[作者简介] 吴博皓,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

① 郭又新:《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2000 年版;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外交评论》2014 年第 4 期;梁志:《作为政治任务的技术培训:以在沪朝鲜实习生为例(1953—195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 年第 3 期。

② 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 - Present*, Lanham: Lexington Book, 2010.

③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 2005 年版;郭又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

④ 关于马来亚,在本文主要指 1948 到 1963 年存在的马来亚联合邦,1963 年与沙巴、砂拉越、新加坡合并,建立马来西亚。

⑤ 姚昱:《试析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的发展》,《东南亚研究》2007 年第 1 期;张勉勋:《中国对柬埔寨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探析(1956—1970)》,《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Bohao Wu, “In the name of Asian Solidarity: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for Technology Diplomacy in Burma, 1955 - 1965,” *Cultures of Science*, Vol. 6, No. 2 (July 2023), pp. 153 - 169.

政策制定过程为中心,考察中国与海外华侨的贸易往来和侨汇对中国政经状况的影响。^①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将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置于冷战早期东南亚地区去殖民化运动逐渐高涨,各国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扩大本国以及本阵营影响力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因此,地缘政治对具体商贸活动的影响,以及商贸活动服务于各国地缘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呈现。针对这一点,本研究希望指出,中国在冷战中与东南亚地区的商业往来,尤其是通过华侨商人进行的经贸互动,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动态过程,对英、美、日三国这一时期的东南亚政策有着持续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阐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同时将其与英、美、日三国的具体博弈过程纳入考察范围。

基于以上观察,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的棉纺贸易为切入点,探究冷战早期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中国东南亚贸易,同时展现中、美、日、英四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商贸活动与地缘政治博弈之间的关联。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棉纺市场的状况,可分为三个阶段:该时段早期,日本通过与美国在外交上密切协调,在经济上接受扶持,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东南亚棉纺品市场的最大进口来源;该时段中期,中国巧妙地动员了包括海外华裔在内的民间力量,帮助国产棉纺品进入东南亚市场;该时段后期,中日两国在东南亚棉纺品市场中展开激烈竞争,并采取一系列商业与政治手段与对手对抗,以为本国商业活动保驾护航。本文所使用的中文、英文、日文档案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中、美、日、英四国的政府文件;二是冷战结束后解密的外交档案;三是中国和日本的民间贸易组织文件。结合这三类史料,本文立足于冷战早期的商业往来,探究其与地缘政治的密切互动,并说明冷战时期的国际贸易如何服务国家的地缘战略构想。

一、20世纪50年代早期日、美、英三国争夺下的东南亚棉纺品市场

二战后东南亚地区棉纺品市场的格局,主要受到日、美、英三国激烈竞争的影响。这一时期日本与美国密切合作,从英国攫取了大量市场份额,打破了英国对该地区棉纺品市场的支配地位。这与美国在1945至1952年对日占领期间为日本提供的经济扶持是分不开的。在这期间,日本的经济与产业政策受到美国控制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以下简称“盟总”)指导,其对外贸易也需得到盟总的认可。^②由于日本经济政策在占领下的非独立性,其外贸政策极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经济的理解和需求。

对于美国占领当局而言,战后日本政府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缓和社会矛盾,防止日本共产党夺权,使日本成为“中立主义国家”;二是恢复日本经济,进而减轻美国对日本的援助压力。由于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想要完成上述两个任务目标,只能通过恢复日本的国际贸易。从美方角度看,日本已经失去了二战前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中国大陆),故必须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寻找替代。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是这一论调的主要支持者,在他看来,日本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前线,所以美国必须让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防止日本在冷战中倒向“中立主义”。^③在占领期间,实际控制日本外贸的美国决策者也从经济角度认识到了东南亚对日本的重要性:一方面,东南亚市场对日本生产的轻工业品有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也能够提供日本所需的大量工业原料,如锡、石油、橡胶、棉花等。^④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于1950年1月通过的备忘录显示,美

^① Glen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Jason M. Kelly, *Market Maoists: the Communist Origins of China's Capitalist Asc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② 对于这一时期盟总与日本通产省经济官僚的互动及前者对日本经济的管控,参见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98-241.

^③ Bruce Cumings, "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in Andrew Gordon ed.,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34-63.

^④ "Current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lating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I, Geographical Area Policies: Part III, Far East-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ovember 1, 1952, accessed September 22, 2021,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265618/USDD?u=camb55135&sid=bookmark-USDD&id=80eb6ac5&pg=1>.

方认为“能否保持并发展日本的经济,将取决于是否能够将共产主义挡在东南亚之外,并使该地区成为日本主要的贸易区域”。^①可以看出,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不仅符合日本的经济需要,也对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利益有重要作用。

美日两国对东南亚的野心刺激到了其盟友,即在东南亚地区保有大量殖民利益,并占据优势市场地位的英国。因此,英国对美日两国在经济扩张上的合作极为敏感。1951年,美日两国就计划组成联合调查团前往东南亚,并制定利用东南亚市场发展日本经济的政策。该调查团引发了英国的严重不满。由于盟总事先并未与英国方面通气,直到该调查团前往泰国时英国驻日外交使团都未能获知该调查团的日程安排。^②因此,英国外交部指示英国驻日外交使团向盟总提出正式抗议,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更是在取得英国外交部许可后拒绝该调查团中的日本代表进入香港。^③7月10日,英国驻日使团向英国外交部发电报,吐露了对美方行为的不满,认为美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上,不惜损害英方利益袒护日本,怒斥美方的行为是“持续性的、武断的、单边的行动”,严重违背了英美两国之前达成的共识。^④英国政府对日本经济代表寻求进入香港一事的强烈反应,也反映出英国对美日两国试图染指东南亚市场的警惕。

日、美、英三方在东南亚市场归属上的矛盾,也深刻影响到了在日英两国制造业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棉纺工业。尽管随着二战的结束,英国棉纺工业依靠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快速复苏,但日本对英属东南亚地区的棉纺品出口额自1947年以来逐年上升,对英国棉纺品在该地区形成了挑战。1950—1954年,日本逐渐取代英国,成为香港、印尼、马来亚、缅甸等市场棉纺品最大的进口来源。^⑤同时,棉布不仅仅是英国各殖民地从日本进口的最大宗商品,英国本土的棉纺业也由于价格因素和产能不足的缘故,从日本大量进口坯布。仅仅在1949年,英国本土就从日本进口了1.78亿平方英尺的坯布,比1948年增加了220%。更让英国贸易部感到焦虑的是英国棉纺业无法避免对日本坯布的依赖:英国若是停止从日本进口坯布,只会提高成本,将本就受到日本棉制品威胁的东南亚市场进一步拱手出让给日本同类产品。因此,英国贸易部的报告认为,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英国的棉纺业已无法与日本同行竞争。因此,英国必须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保护本国棉纺业。^⑥

然而,英国贸易部的意见并未在英国政府中占据主流。相对于贸易部对日强硬的论调,英国外交部与殖民部的官员则秉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认为尽管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会威胁英国本土制造业,但一个经济繁荣的日本却在政治上对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有着重大的价值。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对于日本投向社会主义阵营的恐惧使得英国政府内部对打压日本经济的提案有所顾虑。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内部出现了对日强硬派与对日缓和派两种声音。代表前者的是英国贸易委员会的官员以及时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他们主张对日本在东南亚的野心采取相对强硬的态度。贸易委员会主席亚瑟·帕西维尔(Arthur E. Percival)甚至在1951年底言辞激烈地抱怨“日本将把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和其他几位竞争对手都赶出世界市场,这一路径已然清晰”。^⑦与

① NSC Policy Paper in Asia (January 10, 1950), NSC 61, College Park, MD: Archives II,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②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Japanese Economic Mission,” July 13, 1951, FJ 1127/4, FO 371/92642, Richmo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Public Record Office (以下简称为 TNA-PRO).

③ Alexander Grantham, “Telegram 199, From Governor, Hong Kong, To Con. Gen. Singapore. 213,” July 20, 1951, HKRS No. 163, D-S No. 1-1430,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④ “Telegram No. 236 ‘E’ (EA 1/125/51),” July 10, 1951, FJ1127/2, FO 371/92642, TNA-PRO.

⑤ Bernice M. Hornbeck, *Communist China's Cotton Textile Exports: Their Growth, and Their Effect on World Markets*, Washington D. C.: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59, pp. 18-21.

⑥ “Japanese Threat to the Cotton Industry,” April 6, 1950, FJ 1331/20, FO 371/83898, Richmo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Public Record Office, pp. 146-147, 149.

⑦ Arthur E. Percival, “Japanese Trade in South East Asia,” October 12, 1951, FJ 1127/16, FO 371/92642, TNA-PRO.

之相对的是支持在经贸问题上对日采取温和态度的英国东南亚高级事务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德(Malcolm MacDonald)以及英国驻日大使艾斯勒·德宁(Esler Denning)。1951年10月,麦克唐纳德就通过电报建议英国政府重新评估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及其对英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在麦克唐纳德看来,由于日本工业生产成本逐渐提高,日本产业界,尤其是棉纺业,对英国的威胁不过是“无法证实的幻想”。^①这一论调遭到了英国外交部包括艾登和亚洲部门顾问查尔斯·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在内的强硬派十分激烈的反驳。^②最终,英国各部门未能在1950至1952年间就对日政策达成共识,从而使得英国政府未能拿出任何有效措施反制日本的经济扩张。

英国政府的无所作为使得该国纺织业者感到焦虑。在他们看来,英国政府无法在面对美日压力时保护本国产业。兰开夏郡作为英国纺织业的中心,其地区报纸《曼切斯特卫报》承担了为纺织业者发声的作用。1950年该报发表的社论认为“美国绝不会撤回其重建日本经济的目标”,也不会通过损害日本纺织业来保护其盟友英国的产业利益。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祈求美国主动介入,让其扮演仲裁人,与日本进行利益上的协调。英国自身能做的,不过是采取“温和的政策”来保证不刺刺激美国和日本罢了。^③英国棉纺业者的悲观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英国政府的无力,也在其1950年对日斡旋的过程中暴露无遗。1950年4月,英国政府组织了由英国棉业委员会委员长雷蒙德·斯特里特(Raymond Streat)领头的由英美两国棉纺业代表组成的联合调查团前往日本。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与盟总以及日本纺织协会接触,通过谈判协调各方在棉纺品出口方面的利益。在英国看来,此次出访有三个主要目的:第一,与日方达成瓜分东南亚棉纺市场的协议;第二,限制各方出口的棉纺品门类;第三,对日本出口的棉纺品进行限价。^④然而,协调最终以失败告终。1950年5月8日,斯特里特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谈时,后者向英方代表直截了当地表明尽管他个人乐于见到双方通过协议解决争端,但盟总出于恢复日本经济的考虑,不会支持对日方施加任何强制性条款。^⑤在具体会谈中,与会的美国经济官员更是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根据英方谈判代表的报告,参与会谈的盟总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彼得·麦克德默特(Peter A. McDermott)以及盟总经济与科学局局长威廉·马夸特(William F. Marquat)表达了“完全一心一意恢复日本经济”的态度,并“绝不容忍任何关于瓜分市场以及对日本产品强制限价”的提案。^⑥

由于盟总的支持,日本纺织协会的谈判代表也展现出了异常强硬的态度,不仅不承认英方对日方倾销的指控,还将棉纺出口与“日本国民的生存权”挂钩,拒绝英国所提出的瓜分市场和限制产品种类的要求。^⑦最终,会议并未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决议。三方仅仅在联合声明中,敦促三国的棉纺业者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友好协商和紧密沟通,防止三十年代那样的恶性竞争再次出现”。^⑧这无疑意味着英国试图与美国协调打压日本棉纺业扩张的失败。在英国代表团会后发往

① Malcom Macdonald, “Future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Asi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October 3, 1951, FJ 1127/14, FO 371/92642, TNA-PRO, p. 47; Anthony Eden, “Future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Asia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November 16, 1951, FJ 1127/17, FO 371/92642, TNA-PRO, pp. 90 - 91.

② Charles Hepburn Johnston, “Minutes, Japan’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 E. Asia,” November 6, 1951, FJ 1127/17, FO 371/92642, TNA-PRO, p. 73.

③ “The Revival of Japanese Competi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extiles,” January 18, 1950, FJ 1331/2, FO 371/83898, TNA-PRO, p. 16.

④ F. S. Tomlinson. “Anglo-American Cotton Textile Mission to Japan,” April 28, 1950, FJ1331/25, FO 371/83898, TNA-PRO, p. 162.

⑤ Esler Denning, “P. A. 40/13/50, Confidential and Personal,” May 9, 1950, FJ 1331/27, FO 371/83898, TNA-PRO, pp. 171 - 172.

⑥ “CB. 8132a; Report of British Members of Mission to Japan,” May 1950, May 1950, FJ 1331/33F, FO 371/83899, TNA-PRO, p. 50.

⑦ 日本紡績協会「日本綿紡績業の現状について」『日本紡績月報』総第41号,1950年,26頁。

⑧ 堀文平「最終會議における決議 米英日三国の友好的關係及び他の綿業国に對する友好的關係についての決議」『日本紡績月報』総第41号,1950年,17頁。

英国贸易部的秘密备忘录中,英方就无奈地把失败归因于美国对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视。在他们看来,美国占领当局“出于对遏制共产主义极其强烈的愿望,必然会坚持用日本生产的廉价产品大量供给东南亚地区国家。因此,可以加倍肯定的是,美国不会同意在日本的和平条约中或通过任何法律文件为保护英国的纺织品出口贸易而对日本的出口进行严格限制”。^①换言之,英国代表团已经清醒认识到美国将毫不犹豫把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利益置于其盟友英国的经济利益之上。

英国棉纺业代表团在东京的让步并未换来美日两国的妥协。仅仅两个月后,美方甚至进一步放弃了对日本纺织业产能的限制。1950年7月,麦克阿瑟公开宣布撤销所有“现有的对于日本纺织业可拥有的纺锤数上限的规定”。^②威廉·马夸特领导下的盟总经济部门甚至获得了来自美国国会的支持,并公开鼓励日本棉纺业者每年将总纺锤数扩容80万单位(日本1950年总纺锤数仅为400万单位)。^③由于英国代表团认为自己就扩产问题已经与日美方达成了谅解,这一表态完全超出了其预料。至此,英国试图通过谈判与日美两国就东南亚棉纺业市场达成协议的努力已完全失败。

回顾这一时期的美、日、英三国关于东南亚棉纺织品贸易的决策,我们能够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日、美、英三国的棉纺业极大地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出于稳定和拉拢日本的需要,大力扶持日本向东南亚大量出口包括棉纺织品在内的商品,甚至不惜损害其盟友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逐渐认识到其无力单独应对美日两国在东南亚经济扩张上的合作。在这种认识影响下,英国不再坚持保护本国棉纺织品的东南亚出口市场,同时放弃遏制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扩张。这也使得英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度恢复繁荣的棉纺业再次由于失去东南亚市场而陷入困境。而日本棉纺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棉纺织品的最主要供应者。

然而,日本棉纺业者的优势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中国在“一五”期间大力发展工业,也迅速成为重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上,日本开始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一局面也导致了美日两国政府进一步关注棉纺贸易,并强化包括外交、政治和产业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手段,试图维持其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东南亚棉纺织品市场上的进展

除了英国与日美两国在棉纺贸易上的争斗,中国也在东南亚棉纺市场上展现出积极的姿态。这使得英、美、日三国重新思考对东南亚的经贸及外交政策。^④其中,英国在抵抗日本对东南亚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开始探索通过香港开展对华贸易,以平衡日本对英国在亚洲地区经济利益的影响。^⑤从1951年开始,中国与英联邦国家包括纺织机器在内的棉纺贸易开始增长,并逐渐成为了中英最为稳定的贸易项目之一。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之后,英国开始与中国贸易正常化,开启了中英民

① “CB 8332a: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o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U. K. Cotton Industry,” May 1950, J1331/33, FO 371/83898, TNA-PRO, pp. 94 - 95.

② Alvary Gascoigne, *Despatch No. 'E' 209 (July 5, 1950)*, FJ 1331/36, FO 371/83899, TNA-PRO, pp. 103 - 104.

③ Alvary Gascoigne, *Despatch No. 'E' 217 (July 11, 1950)*, FJ 1331/38, FO 371/83899, TNA-PRO, pp. 114 - 115. 关于日本1950年总纺锤数的统计,出自世界银行1978年的研究报告。Elton Thigpen and Yang Maw-Cheng, *International Cotton Market Prospect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78, p. 19.

④ 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对英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决策过程的影响,可见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8*,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 除了与日本在市场上的直接竞争,英国对于美国默许日本通过香港与中国进行贸易,同时以禁运体系禁止英国同类商品出口中国的做法非常不满,这一点在英国政府内部的讨论中时有体现。如1951年9月,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的电报就批评美国允许日本向中国输出棉纱换取煤炭的贸易是“揭穿了美方限制英国原棉输入香港的最后一丝合理性伪装……这是美国偏袒日本而针对香港的清晰证据”。Alexander Grantham, “Telegram No. 1033, From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rade with Communist China,” September 23, 1951, FJ 11310/4, FO 371/92645, TNA-PRO.

间的商贸往来。^① 1952年6月,中英在东柏林签订了第一批售货合同,其规定英国将向中国出口价值350万英镑的各类纺织品,其中棉纱货值为90万英镑,为该合同内的第二大项。^② 至1958年,除了在香港进行的棉纺织品转口贸易由华润公司直接掌握外,中国与英国以及其他英镑区国家都建立了广泛的棉纺织品直接交易关系。^③ 其中,被中国杂品出口公司列为棉布基本客户的英国公司有8家,包括英国联合非洲公司等,从数量上居于各国榜首,同时英镑区国家公司数量占到基本客户总数的一半以上。^④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商人已习惯于从中国大陆大量进口棉布,用以供应本国纺织厂以及亚非殖民地,中国则进口英镑区国家的原棉,来抵消本国棉花收成的波动。^⑤

中英棉纺织品贸易在20世纪50年代升温,也是中国这一时期恢复国民经济,打破对华禁运,让本国产品走出国门的一个缩影。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联合其盟国出台了对华禁运政策。然而,美国并未得到其盟友的无条件拥护,反倒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政策协调,包括英国、西德、日本在内的各国争相利用禁运规则上的漏洞,试图在对华贸易上分一杯羹。^⑥ 在中国突破对华贸易封锁的过程中,棉纺织品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日本对棉纺织品贸易的依赖,以及香港在日本对外棉纺出口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在限制香港作为棉纺贸易转口港的问题上,不得不向英日两国做出妥协。譬如1952年,英国财政部就通过备忘录指示香港方面绕过对华禁运的规定,为中日之间以英镑结算的棉纺织品贸易提供信用证方面的便利。^⑦ 这一举措并未遭到美方的积极阻挠,而这样的安排也方便了中国大陆通过香港出口棉纺织品,换取外汇。^⑧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对外出口,既有为国家获取外汇的经济意义,也有非正式外交的色彩,通过统战工作,打破外交上的封锁。^⑨ 这两点在棉纺织品贸易上尤为明显:第一,棉纺织品作为中国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在创汇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由于东南亚地区华侨众多,棉纺织品贸易

① 解建群等编著:《贸促春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史(1952—1994)》(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95年印刷,第131—132页。

② 吴浩、刘艳雯:《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1952—1957)》,《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

③ 关于华润公司作为中国在香港地区出口商品的总代理,详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2—235页。

④ 《1958年纱布对资出口总结及1959年经营方案》(1958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34-6-58-1,第37—38页。

⑤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就通过华润公司设立的“印巴三处”从巴基斯坦及印度购买长绒棉供给国内,但并未大量出口棉布棉纱。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向中国输出叙利亚、埃及、英属东非的原棉,而中国则向英国商人出口棉布供给英镑区市场。如中国在1956年通过邦吉公司(Bunge and Co.)购入了7000至8000吨左右的叙利亚棉花以及相当数量的埃及棉花,英国联合非洲公司则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1958年达成了进口价值28万英镑灰布和润幅布的贸易合同。详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红色华润》,第181—183页;中国杂品出口公司上海纺织品出口公司:《关于接待三个外国商人谈判棉布交易的报告》(1957年6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2-340-11;“Revision of Government's Plan to Buy Raw Cotton,” August 30, 1958, FC 1331/5, FO 371/127380, TNA-PRO。

⑥ 面对美国牵头的对华禁运,西欧各国商人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策略来规避禁运规则对其经营产品的限制。如利用对苏东国家禁运清单与对华禁运清单的不同在东欧国家港口进行转口贸易;将被禁运的新产品在合同上标注为不受规则限制的旧货;不出口制成品而是出口仅需要简单加工即可使用的半成品等。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编印:《对外贸易工作先进经验》,1956年印行,第1—4页;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编印:《国际经济关系资料》(第7号),1957年印行。

⑦ J. J. Cowperthwaite, “Memo; L. M. 7052 (52). Barter Transac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inanced Through Hong Kong,” September 17, 1952, HKRS No. 41, D-S No. 1-7303,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⑧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禁运体系上对英日两国做出了妥协,包括放松一部分物资管制以及不干涉香港作为对华贸易的转口港的地位。这是由于英国艾登内阁与日本鸠山内阁在对华禁运问题上的紧密协调,以不再遵从所谓“中国委员会”的禁运清单为筹码,使得艾森豪威尔政权为了维持对社会主义阵营禁运,于1954至1956年间逐渐缩小了对华禁运的范围。对于这一外交交锋过程,详见Michael Schaller,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0-95。

⑨ 关于这一点,参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红色华润》,第253页。日本外务省也在其汇总的日本驻各东南亚使领馆报告中,指出中国与本地区华侨通过贸易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见外務省アジア局第二課長「東南アジア諸国に対する中共の動き(在外公館の報告要旨)」(1955年11月)『中共の対外政策関係雑集 対アジア関係 調査,資料』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分類番号A.2.1.0.C(C)1-1-1,史料管理番号100-030020。

也承担了与侨商建立联系,并向当地华人呈现新中国经济成就的任务。^① 1956年,华润公司在提交给对外贸易部的报告中,指出了华侨群体的重要性。^② 在香港,华润公司不仅积极邀请来港华侨参与包括广交会在内的商业展览会,也派出人员参与新加坡、马来亚等地面向当地华侨的贸易展览;^③在吉隆坡,中国银行海外分行也与愿意经营国货的在马侨商接洽,为其提供贷款与信用证方面的便利。^④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侨商也会接触中国对外贸易部门,以获得其经营国货的便利。如在1957年,中国就应缅甸、印尼侨商的请求,派出技术人员,协助他们创办使用国产棉纱、纺机、织机的服装厂,以深化同他们的经济联系。^⑤

对东南亚华商群体的争取,也使得后者成为中国对东南亚棉纺贸易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侨商从包括华润公司在内的渠道进口国货,在地区市场上承销中国棉纺织品;^⑥另一方面,侨商网络也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信息来源。在香港,华润公司从东南亚华侨经营的商行那里,获取了许多外商的市场信息。^⑦ 因此,在与来访的外国商人谈判时,相关部门往往展示出其对国际市场动态的精确把握。怡和洋行贸易代表阿兰(A. L. Allan)于1957年到访北京,与中国杂品出口公司洽谈将英属东非产原棉出口到中国事宜。在阿兰结束访问后,英国驻香港经济研究处与他谈话,并向上级报告由于中方对于市场动态的把握,阿兰不得不以接近心理底价的价格与中方达成协议。^⑧ 在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看来,新中国对侨商的吸引力,对其东南亚战略构成了威胁。美国外交行动协调委员会于1957年发布的政策指导文件,就表达了美外交界的这一认识,认为东南亚华侨社群“对美方和自由世界的益处极小,但对中共益处极大。因此,美国的主要政策目的是阻碍中国通过华侨获取战略利益”。具体到商贸层面,美方认为新中国对东南亚华商的吸引力,源于东南亚对棉纺织品等轻工业品的巨大需求。侨商既是“北京对东南亚‘贸易攻势’(Trade Offense)的目标,也扮演了中间渠道”。^⑨

同时,这份政策指导文件也认为,由于万隆会议后亚洲民族解放情绪高涨,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不应直接下场对抗中国,而应通过地区盟友达到其战略目的,包括鼓励中国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华商,以及加强日本产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从而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随着秉持独立外交政策的石桥湛山内阁于1957年为相对亲美的岸信介内阁所取代,日美两方也进一步达成了关于利

① 例如对于愿意帮助宣传和经营国货的侨商,对外贸易部往往给予便利。如在新加坡邵氏兄弟大世界工商展览会上展出国货的侨商,对外贸易部就提出给予补贴广告费,并给其进口商品打10—20%折扣的方针。参见《关于新加坡侨商要求我支持参加大世界展览会问题》(1957年7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30-2-298-16。

② 《关于日货在东南亚市场与我竞争等情况报请参考》(1956年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2-378-12。

③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红色华润》,第267—268页;解建群等编著:《贸促春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史(1952—1994)》(上),第218—221页。

④ 关于中国银行在东南亚地区分行与海外华商的接触,参见 *Intelligence Report No. 7219: Effect of Recent Chinese Communist Socialization Measures on Overseas Chinese Opinion and Remittances (April 26, 1956)*, FC1823/24, FO 371/121005, TNA-PRO; 关于中国银行马来亚分行(吉隆坡)为海外华商提供融资支持的相关情况,参见 *Joint Intelligence Bureau, Colonial Office, Chinese Exports to South East Asia: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Intelligence Bureau With Appendix by the Colonial Office (October 15, 1958)*, FC 1121/15, FO 371/133394, TNA-PRO, p. 4。

⑤ 如印尼华侨俞华楨的远和公司创办的汗衫厂,就从中国进口全套机器和原料,并请对外贸易部协调派遣技术人员协助。《申请赴印尼远和公司往返旅费外汇事由》(1957年9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30-2-243-22。

⑥ 具体来说,华侨商人在香港购入中国商品的时候,往往会获得来自华润公司帮助。如泰国的华侨商人在香港往往通过华润牵线,利用友好商行(如五丰行和德信行)的担保办理信用证以及优惠条件的贷款,从而进口中国产品并运往所在国进行销售。关于这一情况,参见 Richard Whittington,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Imports into Thailand of Certain Goods Manufactured in Communist China,” August 7, 1958, FC11340/3, FO 371/133402, TNA-PRO; 关于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棉纺织品出口中扮演的角色,参见 Bernice M. Hornbeck, *Communist China's Cotton Textile Exports: Their Growth, and Their Effect on World Markets*, p. 9。

⑦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编:《红色华润》,第248—259页。

⑧ “Confidential No. 063/57/A. 56, To P. C. F Dalton Esq.,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October 14, 1957, FC1122/22, FO 371/127322, TNA-PRO。

⑨ *OCB 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ecember 11, 1957)*, OCB Files, Lot 62, D 430, Box 28, College Park, MD: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pp. 3, 15。

用日本的经济能力在东南亚对抗中国的共识。^① 1957年6月,岸信介访美并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John F. Dulles)等人会面时,介绍了他之前对东南亚访问的情况,并认为“共产主义渗透”对该地区的威胁“迫在眉睫”。为了减轻这一威胁,岸信介承诺,日本愿意向该地区提供“资本和技术知识”,并请求美国协助,与日本一同创立旨在增强地区采购能力的“亚洲支付联盟”。^② 虽然艾森豪威尔坚持其不向地区组织投入美国财政资源的立场,并在随后的会谈中明确拒绝了岸信介关于帮助建立由日本主导的地区经济组织的建议,但他完全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南亚扩张的估计,并表示将对日本的反制手段提供援助。^③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美国加大了对日本棉纺业的扶持。这些举措也包括艾森豪威尔政权借助1954年通过的第480号公法,为东南亚国家采购日本棉纺织品提供便利。第480号公法力图解决东南亚地区由于缺乏外汇储备,对美国农产品购买意愿不高的问题。同时,该法案也试图将美国过剩农产品用于对外援助,从而缓和受援国社会矛盾,防止亲美政权被推翻。^④ 在该框架下,日本的棉纺业成为重要受益者,其主要通过美棉日纺模式,即美国产原棉在日本被加工成棉纱或棉布,然后输往东南亚市场。具体来说,就是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与东南亚某国商谈援助的时候,将日本拉入,签订一个三方供货协议。美国将商定好货值的棉花输往日本,由日本将该批货物加工成等值的棉布或棉纱,并贩售到该国,然后由该国政府以本国货币计价,向美国贷款,从日方手上购买这批货物。根据日本纺织协会调查部撰写的报告,仅在1955至1956年,日本就通过这种方式向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三国输出了合计价值1亿3324万美元的棉纱和棉布。^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自己的评估中,美棉日纺模式的动机主要是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美国国务院于1955年9月的一份关于对印尼适用第480号公法出口棉花的内部指导文件中,就解释由于东南亚国家外汇缺乏,这些国家更倾向于从中国,通过易货贸易,购买相比日本更加廉价的棉制品。因此,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需要通过援助让日本向印尼提供更多棉纺品,以“修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棉纺品的依赖。^⑥

除了美棉日纺模式之外,美方还通过财政和外交等手段,提高日本棉纺业在该地区的竞争力。例如,美国进出口银行作为美国政府官方信贷机构,在1955至1959年,向日本提供了超过3.31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于购买美国棉花。^⑦ 1954年3月8日,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关于购入农产品的协定》及作为其补充条款的《日美经济措施相关协定》,要求在1954年6月前由日本采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根据这两份协定,美国不仅将在日本银行设立以美元计价日元结算的账户,同

① 值得注意的是,日美双方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东南亚开发问题上虽然达成了部分共识,但在包括美国是否为日本主导建立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出资,是否允许利用美国资金援助地区内秉持外交中立主义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大量分歧。参见 Bohao Wu, *Uneasy Friends and Convenient Enemies: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Cold War Asia, 1950-1972*,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23.

②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Washington, June 19, 1957, 11:30 a. m.,” June 19, 19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Japan, Vol. XXIII, Part 1, Document 183*, pp. 373-374.

③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Washington, June 19, 1957, 11:30 a. m.,” June 19, 19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Japan, Vol. XXIII, Part 1, Document 183*, pp. 374-375. 关于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对“亚洲支付联盟”以及“亚洲开发基金”的构想,参见長谷川隼人『岸内閣期の内政・外交路線の歴史的再検討:「福祉国家」「経済外交」という視点から』博士学位論文,一橋大学,2020年。

④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P. L. 480 Concessional Sales: History, Procedures, Negotiations and Implementing Agreements*, USDA/FAER-142, Washington D. C.: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77, p. iv.

⑤ 日本紡績協会調査部「綿業から見た東南アジア市場の将来性」『日本紡績月報』1956年第118号,65—66頁。

⑥ “Guidelines for the Export of Japanese Cotton Textiles under U. S. Public Law (PL 480),” September 6, 1955, accessed September 22, 2021, <https://link.gale.com/apps/doc/CK2349599400/USDD?u=camb55135&sid=bookmark-USDD&xid=dd741680&pg=1>.

⑦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 S. Agricultural Exports Under Public Law 480*, Washington D. C.: Foreign Demand and Competition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1974, p. 250.

时也向日方的采购计划赠与 1000 万美元(占总采购额的 20%) 贷款。^① 这些贷款被日本政府转给包括棉纺业者在内的制造业者,用以采购所需的美国农产品。在外交方面,美国外交行动协调委员会关于东南亚的经济援助政策中,提出美国应进一步增强对日本在东南亚经济活动的支持,包括通过“生产力项目协议”对日本提供技术援助,以提高其贸易竞争力,以及随时准备不公开地动用美国货物,帮助日本解决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方便与这些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② 从美方扶持日本棉纺织品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来看,对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既是美方的主要动机,也是美日两国关于棉纺织品系列合作共识的基础。

从这一时期东南亚棉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可以看出,尽管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其商贸活动都与本国的地缘政治考量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这一博弈中的主动性,通过棉纺织品贸易,扩大本国的经济影响力,并对抗美日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企图。中日在东南亚的棉纺织品竞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尤其是 1957 年岸信介内阁上台之后愈演愈烈,并在 1958 年中日贸易全面中断前后,成为两国在东南亚地区角力的一个主要着力点。

三、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对东南亚棉纺织品市场的出口斗争

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积极与东南亚国家代表接触。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包括印尼、老挝在内的部分地区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然而,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蒸蒸日上,日本纺织业与部分经济官僚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在东南亚市场上的潜在对手。这一时期,中国棉纺织品一方面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另一方面也借着万隆会议后外交上的有利局面,与诸多亚非国家签订了包括棉纺织品出口在内的易货贸易协定。相比于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的 1953 年,中国与印尼的贸易额在 1956 年达到了前值的 14 倍,与缅甸的贸易额也增长了 15 倍。^③ 中国棉制品在东南亚的市场份额也快速提高:从 1954 年第一季度到 1958 年第三季度,在印尼的市场份额由 1% 增长到 14%,在马来亚则由 1% 增长到 8%。除对东南亚市场的直接出口外,中国纺织品在香港市场中的份额也快速攀升,1952 年时,占比不到 2%,而到 1958 年时则已超过 30%。^④ 如表 1 所示,1952—1958 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贸易关系稳步发展,这与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商品棉纺织品市场份额的节节攀升是分不开的。

表 1 中国与香港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地区)贸易额统计(1952—1958 年)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香港	印度尼西亚	缅甸	马来亚/新加坡
1952	236.3	1.9	0	39.4
1953	244.5	2.1	3.2	36.1
1954	189.5	3.5	2.2	34.9
1955	213.5	16.7	37.3	42.0
1956	205.5	42.9	37.3	50.9
1957	219.6	53.3	21.6	76.4
1958	271.8	85.2	19.6	102.0

资料来源:赤谷源一「共產圏諸国の低関税諸国に対する経済進出」『外務省調査月報』総第二号(1960年5月),135—136頁。

说明:1957年前,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都处在英国殖民体系中,分别为英国的保护国与直辖殖民地,根据英国殖民部的划分,二者属同一市场,故各国统计资料统计时一般将两地区合并。直到 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前各国均采取此统计划分方法。

① 「農産物の購入に関する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協定」1954年3月8日 外務省条約局『主要条約集』第32集第8卷,国立印刷局,1991年,639—640頁;「経済的措置に関する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協定」1954年3月8日 外務省条約局『主要条約集』第32集第8卷,640—641頁。

② *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a Proposed U. S. Economic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 (December 7, 1955)*, OCB File No. 78, Box 2, Intelligence Reports Series, Albino, Kansas: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③ “Red China Intensifies Trade War in Asia: Sato,” *The Japan Times*, July 17, 1958.

④ Bernice M. Hornbeck, *Communist China's Cotton Textile Exports: Their Growth, and Their Effect on World Markets*, pp. 18—21.

对于分处冷战两个不同阵营的中国与日本而言,两国棉纺织品在东南亚市场上的碰撞不仅关乎两国的商业利益,也与地缘政治直接挂钩。上海纺织品出口公司1958年的工作总结,就直接指出中国棉纱出口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秉承“凡是日本货到的地方都要去和他竞争”这一态度,棉纱出口是“支援民族国家斗争的,同时吸引华侨用处很大”。^① 随着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的石桥湛山在1957年被亲美的岸信介取代,中日两国在棉纺织品贸易上的竞争也被赋予了更强的对抗意义,从而更加表面化,两国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采取对策应对竞争。

在斗争初期,中国的外贸人员主要通过商业手段,与日本出口商竞争。如对所产棉纺织品进行针对性调价。1956年,华润公司就在报告中建议外贸部门采取针对日货的一系列策略,如“对占日货销售东南亚40%比重的英属新加坡香港等地加以坚决排挤打击”,并对标日货控制出口商品的售价,认为“价格掌握仍应继续执行较日货略低的原则,如市场有稳固地位的可平齐”。^② 价格策略效果十分明显:在香港,英国联合情报局报告中国出口商在香港采取了“针对日本商品的极富技巧性的价格策略,从而将日本商品挤出本地市场”。^③ 在香港之外,中国外贸公司也集中资源,对日本在本地市场优势不大的商品进行打击。1958年,在香港把日本两种细布赶出市场,同时在泰国也通过漂色布上的优势打击日本同类产品。^④ 据《南洋商报》报道,仅在1958年前两个季度,在新加坡地区就有15%—25%日本棉纺织品遭受来自中国商品的挑战并被取而代之。^⑤

日本工商界也明确意识到来自中国棉纺织品的竞争,并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抗措施。时任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藤山爱一郎的言论非常有代表性,这位曾经在吉田茂内阁时期大力支持恢复对华贸易的工商巨头在1955年9月的一次采访中认为,如果日本能够开发东南亚和近东市场,它就不需要依赖中国和苏联的市场。因此,日本必须在东南亚市场上出口廉价且质量合格的商品,从而赢得与中国的竞争。^⑥ 作为日本纺织业者的传声筒,日本纺织协会于1956年7月在其会刊《日本纺织月报》上,发表了卷首语,向业者传达了“在特定市场上,中国将愈加成为我国棉制品出口重要竞争对手。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所觉悟”。^⑦ 从1956年开始,对华棉纺研究就成为了其调查部门的重点课题,并在会刊上刊登了大量关于中国棉纺织业的报告。^⑧ 同时,日本棉纺织业者也请求政府介入帮助他们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1958年7月16日,时任日本财政大臣佐藤荣作就宣扬中国在东南亚市场上对日本的“威胁”,认为中国通过“将价格控制在比日本低10%—15%的水平上”来增强竞争力,是一场针对日本的“贸易战”。同时,佐藤荣作也大肆抨击中国,将中国在东南亚市场上的正当行为定义为“渗透”,将之归因于“中国策略性地利用了海外亲北京的侨商和金融机构”以及“在棉纺与陶瓷类商品上对日本同类产品的抄袭”。^⑨ 佐藤荣作的发言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即视东南亚市场为禁脔,并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成果采取全面对抗的态度。

① 《1958年纱布对资出口总结及1959年经营方案》(1958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34-6-58-1。

② 《关于日货在东南亚市场与我竞争等情况报请参考》(1956年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2-378-12。

③ *Chinese Exports to South East Asia: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Intelligence Bureau With Appendix by the Colonial Office (October 15, 1958)*, FC 1121/15, FO 371/133394, TNA-PRO, p. 4.

④ 《1958年纱布对资出口总结及1959年经营方案》(1958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34-6-58-1,第7—8页。

⑤ 《价格低廉适合购买力 中国针织品销马增进 途商向其他各输出区订购额减退》,《南洋商报》1958年7月28日,第4版。

⑥ 藤山爱一郎「藤山爱一郎氏との対談」『大陸問題』1955年第9号,16页。

⑦ 日本紡績協会「綿製品出口国になつた中国」『日本紡績月報』1956年第114号,1页。

⑧ 日本纺织协会的会刊为《日本纺织月报》,从1956年到1959年间,日本纺织协会调查部在该刊物上连续发表了针对中国棉纺织品出口的调查报告,并对中国出口棉布对日本产品的威胁进行分析。如:山名正孝「新中国における紡織工業の発展状況——中国紡績研究第二号」『日本紡績月報』,1956年第115号,2—8页;日本紡績協会調査部「東南アジア市場調査報告書(概要)——中共綿製品進出状況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紡績月報』1958年第144号,2—23页。

⑨ “Red China Intensifies Trade War in Asia: Sato,” *The Japan Times*, July 17, 1958.

具体而言,包括产业和外交政策在内,日本政府采取了一揽子政策来应对中国棉纺品的竞争。对内,通商产业省(以下或称“通产省”)在日本棉纺业集中的富山县设立了特别基金,鼓励对东南亚市场进行针对性调研,并防止棉纺业者内部的恶性竞争。^①同时,通产省也采取了直接干预市场的方式,于1958年初将棉纱和棉布的出口限价向下调整了17%—20%,从而鼓励日本棉纺业者削价出售。^②在外交方面,岸信介于1957年出访东南亚地区之际,与包括英国驻东南亚专员、新加坡总督、马来亚联邦首相、印度尼西亚副首相在内的地区官员会谈,大肆宣扬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的论调,并呼吁各国采取包括关闭中国银行在地分行在内的各项限制措施。^③同时,日本外务省也以商业访问团为掩护,安排纺织业者进行对华商业情报工作。根据英国驻泰国使馆的电报显示,日本在1958年以“贸易代表团”的名义向东南亚各国派出了三支商业访问团,但这些“访问团”实际上并不进行商业谈判,而是专门收集中国棉纺出口情报,包括中国商品在本地市场中的承销方与其资金来源,以及中国棉纺品定价等信息。^④这些信息随后被日方转达给日本棉纺贸易商。

日本对华的敌视态度也受到了美方的鼓励,后者甚至进一步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拉入,意图在对东南亚华侨的争取上展开竞争。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与中国台湾当局形成了针对东南亚市场的合作。在1958年7月日本与中国台湾当局开展的“日华协力委员会”会议上,双方达成了让日本商人通过国民党掌握的华侨网络向东南亚推销包括棉纺品在内的商品,并试图通过国民党控制的在泰“侨领组织”组织泰国华商访问日本。^⑤然而,美国在向日本棉纺业提供便利的同时,却从1957年开始,出于保护美国本土纺织工业的需要,要求日本对美承诺“自主出口限制”以主动减少对美国的棉纺品出口。^⑥据此可以看到美方对日本棉纺业的支持并非是为了增强日本经济本身,而是为了定向增强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以服务于其对抗中国的目的。

面对日美两国在舆论上无端攻击中国论调,中国采取了团结和对抗的策略。对外贸易部官员在接待西欧以及亚非国家代表时,会详细解释中国棉纺品的定价情况,表示由于经营棉纺品的出口公司往往也经营其他商品,调低棉纺品价格是为了贸易合同的顺利执行,而不应该被作为孤立现象看待。^⑦针对美日两国的打压,中国不仅在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后号召东南亚华侨抵制日本商品,也

① 《日本制造棉织品 仍能与中竞争 日本商行代表如是宣称》,《星洲日报》1958年8月14日,第13版;《日倾全力争取东南亚棉织品市场 中英印亦不甘示弱 将与日货激烈角逐 日制造商计划在马设办事处》,《南洋商报》1958年1月28日,第9版。

② 《1958年纱布对资出口总结及1959年经营方案》(1958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34-6-58-1,第6页。

③ 岸信介对华抹黑的论调在东南亚起到的效果不一。在英国驻东南亚专员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看来,日本的提议将会危害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港的地位,因而不打算在新加坡采取任何措施。但马来亚首相却在会谈中赞同岸信介加强日马合作的观点,并于1959年关闭了中国银行驻吉隆坡分行,为中国-马来亚贸易设置了许多障碍(与此相对,英国并未关闭中国银行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分行)。参见大臣官房総務課『岸総理東南アジア諸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ニュー・ジーランド訪問関係 訪問国首脳との会談記録』1957年12月1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分類番号A'1.5.1.5-3,史料管理番号100-010417;“Bank of China, Position at Present,” January 19, 1959, FC1111/4, FO 371/141277, TNA-PRO。

④ “Letter 10112/58, to Far Eastern Department, Foreign Office, London, S. W. L.,” September 22, 1958, FJ11323/1D, FO 371/133402, TNA-PRO。

⑤ 王文隆:《日本透过中国国民党网络在东南亚扩张贸易的尝试(1950—1961)》,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resources/tokyo/ez3_contents_nsf/15ae977a6d6761f49256de4002084ae/9985292037255ce449257b7c002bc433/MYFILE/2012wangwenlung.pdf, 最近访问时间:2024年5月19日。

⑥ 为解决日本对美国大量出口纺织品导致的贸易摩擦,美日两国于1957年1月16日达成了针对纺织品为期五年的“自主出口限制”协议,将日本每年对美输出的纺织品数量限定在2.35亿平方米(约合1.965亿平方米)以内。关于美日“自主出口限制”谈判的过程,参见William McClenahan, “The Growth of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6-1969,”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20, 1991, pp. 182-183。

⑦ 类似的表述在不同场合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及各出口公司采用。如在1958年12月16日,时任英国驻北京使馆商务代表李希(Ken Ritchie)与接待他的中国对外贸易部代表陈明的谈话。参见Ken Ritchie, “From British Embassy Peking, Conversation with Chen Ming,” December 16, 1958, FC1151/79, FO 371/133415, TNA-PRO。

加强了在东南亚市场对日本产品的打击,同时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①在1959年针对棉纱、棉布的出口规划中,上海纺织品出口公司就提出了要采取“对外贸易服从政治”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增强对日美两国棉纺品的斗争,另一方面要防止和印度等棉纺品出口大国“碰头”,以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帝斗争。^②这些斗争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参与的东南亚棉纺贸易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冷战早期地缘政治与国际贸易的密切互动。在该时段早期英国迫于压力对美日妥协,放弃遏制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经济扩张,到该时段中期与后期中国通过争取华侨商人,在东南亚的棉纺贸易上与美国扶持的日本棉纺业展开激烈竞争,政府的直接干预,在冷战早期的商贸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并非仅仅通过产业、关税、外贸政策等经济层面的手段干预国际贸易,而是积极利用各个层面的外交渠道,为本国的国际贸易铺路。从美、日、英对东南亚棉纺市场的干预来看,这三国往往不惮于让官方机构出面,在正式外交活动中,堂而皇之地为本国产业谋取商业利益。如借着高层访问的契机,向对方提出政策建议;通过驻外使馆,向所在国施加压力;以官方访问团为掩护,让本国商人进行商业情报工作。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秉持的人民外交路线。由于1949年后面临的外交封锁,中国的外贸工作者更习惯于通过半官方以及民间渠道,接触对华友好的商人和海外华侨,以打破外交和经济封锁。

在政府利用外交资源为本国国际贸易提供便利的同时,国际贸易也被用来促进本国的地缘战略。从解密的各国外交文档来看,各国对棉纺品贸易的干预,并非单纯基于从中攫取更多经济利益的需求,而是通过国际贸易服务本国地缘利益。中国通过侨商开展的东南亚棉纺贸易,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促进固然明显,但其打击日美、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尽管美国通过各种手段为日本棉纺业在东南亚的扩张提供便利,华盛顿却并不乐见本国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被牺牲。因此,在与日本就东南亚开发上进行合作的同时,美国也对其施加压力,并直接限制日本棉布对美出口。可以说,美国扶持日本经济的重要动机,是增强日本在特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服务于其对抗中国的战略。在这些地缘因素主导下,20世纪50年代的棉纺品贸易呈现出了较强的国与国之间对抗性的色彩,从而展现了冷战时期,亚洲地缘政治所具有的对立性特征。

同时,本文也对参与棉纺贸易的非政府组织(如日本纺织协会)以及东南亚华商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并据此试图展示将视线投向冷战时期的经济外交,可以将非官方力量在冷战中的作用纳入研究框架,从而扩展既有对亚洲冷战研究的边界。本文中,我们能够看到不仅各国政府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干预国际贸易,民间贸易组织和个人也乐于主动靠近政府,并利用后者帮助其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地位。无论是日本纺织协会利用盟总的庇护,对英国棉纺业代表表现的强硬立场,还是在面临中国棉纺品竞争时,日本纺织业者对日、美以及中国台湾当局等多方势力的利用,抑或是侨商主动联系中方对外贸易公司及机构,获取融资、采购,以及技术上的便利,都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贸易中,民间力量与政府机构的密切互动。据此,我们也可以一窥在冷战这一场全方位、高强度、长时段的大国竞争中,民间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动员起来,为国家战略服务的情况,进而思考冷战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斗争之外所具有的广阔图景。

^① 关于中国号召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在各国产生的影响不一。根据英国驻东南亚各领馆的报告,抵制号召在缅甸、柬埔寨、马来亚、新加坡获得一定声援,而在泰国、印尼、菲律宾、南越效果不佳。参见“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July 29, 1958, FC 11323/1, FO 371/133399, TNA-PRO。

^② 《1958年纱布对资出口总结及1959年经营方案》(1958年12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34-6-58-1,第32—33页。

PRC'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An Investigation of Cotton Textile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50s

Wu Bohao

Abstract: The decade from 1950 witnessed rapid development of decolo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s the region gradually moved away from economic dependence on the colonial suzerains, it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export market for China's commodities, especially cotton textiles.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compe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Britain for cotton products in Southeast Asia. However, the economic diplomacy four countries employed to facilitate export served not only economic interests, but also their respective geopolitical schemes. Through demonstrat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 mechanism between London, Tokyo, and Washington, as well as Beijing's use of "people's diplomacy" to mobilize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this paper shows how cotton textile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was incorporated as a part of the Cold War confrontation.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entities. By showing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Cold War confront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Keywords: Cold War, Cotton Textile, International Trade, Geopolitics, Overseas Chinese

(责任编辑:马烈)

《宋代田赋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简介

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田晓忠副教授著《宋代田赋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202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宋代国家主体赋税制度——田赋制度为研究对象,在细致梳理并分析唐宋国家主体赋税征收对象变化及其演进趋势基础之上,对宋代田赋制度的构成及其具体内容作了仔细钩沉考辨,讨论了宋代田赋的附加税问题、田赋负担的不平衡性问题,进而从国家财政结构与财政运转角度作出分析解释,对宋代田赋制度及田赋负担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该书认为,国家主体赋税制度由人丁为本到以土地田亩为主的变化,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决定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主导因素发生变化,即唐前期农业经济发展主要受限于劳动力资源紧缺,故国家以人丁为赋税课征对象和计税依据,便能获得主要的农业产出收入,唐代以后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变成了土地资源,国家对土地进行征税,更契合于赋税征收的合理性原则;二是原有的以人丁或户均占有百亩土地的固定关系被打破,对人丁征税也变相等同于对土地征税的制度土壤消失,以占有田亩多寡或资产多少征税,更符合赋税征收的公平性原则;三是在田土丈量手段和技术更新的前提下,对不同土色田亩征收相应赋税并将之制度化,符合税制演变后的稳定推行。

该书对构成宋代田赋制度的基本要素进行逐一考订,还原了宋代田赋及田赋制度的基本构成及其大致面貌。著作考述了宋代田赋征收物品、亩征税率、征纳期限等具体构成,同时对北宋方田均税法、南宋经界法与税制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究,提出宋代以均税为目的进行的田土清丈与核实工作,是国家因田制赋制度建设的重要构成、充实并完善了宋代的田赋制度建设。该书还对宋代田赋附加税作了仔细甄别与考察,点明了田赋具有赋外加赋的特征,同时揭示了宋代田赋的区域性不平衡和阶层性不平衡特征。该书分析了宋代财政中央集权与地方财政运行困境之间的矛盾,指出这是导致宋代田赋负担加剧的制度结构原因。该书提出宋代田赋正税负担并不重,但附加税和杂税负担沉重。该书最后指出,在从唐到宋的整个赋税演进过程中,国家田赋制度总体上朝相对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明清时期国家主体赋税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依据。

总体而言,该书对宋代田赋制度演进的来龙去脉、赋税制度调整的具体做法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对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进轨迹、宋代国家与百姓赋税负担关系变化有一定参考价值。(杨万鹏)